

前 论

日本朱子学之传播

第一章

隋唐时代汉文学东渐史略

一、日本儒学的起源

相传汉字传入日本，是日本文字的起源，同时也是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的开始。^①斋部广成在大同年(806—809)为《古语拾遗》作序云：“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亡”。又大江匡房《菅崎宫记》云：“寻其本体，应神天皇之神灵也。我朝书文字，代结绳之政，即创于此朝”。^②这就是说日本文字实始于应神天皇汉学东渐时期。冈田正之所著《近江奈良朝之汉文学》亦持此说，指出汉籍的传来，有徐福赉来说，神后征韩收回说。二说皆不可信，而当以日本国史记载之应神朝开始说比较可靠。应神朝以前日本与中国及三韩已有物质文化的接触，如《后汉书》一一五所述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及光武赐以印绶之事。《魏书倭人传》也有关于拥戴女王卑弥呼的邪马台国的记载。邪马台是日文“大和”的音译，卑弥呼是日文“姬尊”的音译。证以天明四年(1784)二月筑前糟尾郡志贺岛发现汉委奴国印，又加以在博多湾发见的汉代货币和陶器，可见中国和日本的交通很早，在

汉魏时代就发达了。不过此时的文化接触，实以朝鲜为媒介，即《文献通考》卷三四所云“倭人初通中国也 实自辽东而来。”所以无论博多湾所发见的许多中国制之货币、陶器、铜剑、铜铤，筑前国筑紫郡并系岛郡所发见的弥生式系统之甕棺，乃至精尾郡之汉委奴国印，其交通路线皆从陆路辽东而来。因此日本所受中国文字的影响，必然经由带方、乐浪等地方传入日本。相传约当公历 284 年即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使者阿直歧到了日本为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师。翌十六年（285）百济博士王仁由于阿直歧的推荐，率冶工、酿酒人、吴服师赴日并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就是汉文字流入日本之始。其后继体天皇时（513—516）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高丽五经博士高安茂、南梁人司马达赴日，又钦明天皇时（554）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等赴日，这可以说是以儒教为中心之学术文化流入日本之始。但虽如此，直至推古天皇的三百年间，关于汉文学的文章却一篇不存。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皇上稚郎子与兄皇子大鸕鹑命之间皇位的推让一事甚似《论语·泰伯篇》所记泰伯的事迹传为日本盛事。又大鸕鹑命即位称仁德天皇，曾罢免人民三年课役他的行仁政和《论语·颜渊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话极相似，因此日本学者也认为受儒学的影响。^③但真正儒学的影响，有历史记载可考的，还应该推到 7 世纪圣德太子的“推古朝的改革”和大兄皇子的“大化革新”。大化革新有人仅仅把它看成是对唐朝制度的模仿这是完全错误的。野吕荣太郎指出：这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的矛盾，以致产生了信仰上的破绽和政治上的对

立 特别是在与朝鲜、中国开始交通 输入了儒教以后 就越发使它的矛盾对立，互为因果地尖锐化起来。由于天皇及大臣、大连等 强大诸‘氏’间 势不两立的抗争 终于使早已成为躯壳的氏族制度 归于溃灭 而有了‘大化革新’的出现”。^④

这在大陆上，已经是隋唐时代了，因为儒教和佛教传入日本，发展成为大和贵族之间争取统治地位的武器，所以那时候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要特别向隋朝派遣留学生来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

推古天皇十二年(604) 圣德太子发布《十七条宪法》 原文见《日本书纪》卷二二 其中有许多用的是《五经》和《论语》的文句或改作。^⑤ 圣德太子据《汉学纪源》卷一贡士第七条说：

太子圣德，以聪敏资，好读汉籍，习佛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驾，内外通悟。……太子愈好汉土之风 始制冠位。又明年制《宪法十七条》 改定朝礼 《书纪》 则唐王维所谓正朔本于夏时 衣裳同乎汉制云 亦应言之也。

这《宪法十七条》纯用汉文学体 除了第二条‘笃敬三宝’项与第十条“绝忿弃嗔”项是佛教思想之外，其余各条据学者分析，都是依据儒教经典及子史等书。例如，第一条“以和为贵”本《礼记·儒行》及《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上下和睦 本《左传》十六年‘上下和睦’与《孝经》“民用和睦 上下无怨”。第三条‘君则天之 臣则地之’本《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与

《管子》“天复地载”本《礼记·中庸》“天之所复 地之所载”；“四时顺行”本《易·豫卦》“天地以顺动 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上行下靡”本《说苑》。第四条“上不礼而下不齐”本《韩诗外传》及《论语》“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第五条“有财之讼 如石投水 乏者之讼 似水投石”本《文选》李萧远《运命论》“其言如以石投水 莫之逆也”。第六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本《礼记·礼运》“君仁臣忠”；“惩恶劝善”本《左传》成公十四年。第七条“人各有任 掌宜不滥 其贤哲任官”本《尚书·咸有一德》之“任官惟贤材”；“克念作圣”本《尚书·说命篇》。第八条“公事靡监”本《诗经唐风鸛羽》、《鹿鸣四牡》之“王事靡监”。第九条“信是义本”本《论语》“信近于义”。第十条“彼是则我非”本《庄子》；“如环无端”本《史记·田单传》。第十二条“国靡二君 民无二主”本《礼记·坊记》“天无二日 土无二主”及《孟子》。第十五条“背私向公 是臣之道矣”本《韩非子·五蠹篇》“自环者谓之私 背私谓之公”与《左传》文公六年“以私害公非忠也”；“千载以难待一圣”本《文选·三国名臣传序》。第十六条“使民以时 古之良典”本《论语·学而篇》“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如上所述 以《宪法》条文中所见《五经》、《论语》之出处之多 可见其所受儒学之影响极大。推古天皇十五年(607)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致隋炀帝国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盖圣德太子一面钦慕中国文化，一面又尊重国家的体面，故对隋取对等的态度。”^⑥翌十六年(608)妹子偕隋使裴世清等还日，九月隋使归国又遣妹子送之，并以留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等八人从行，这可以说是日本与中国文化直接交涉时期的开始。

在第三次遣隋使派遣之后四年，隋亡，继之乃有遣唐使之举。遣隋使留学期间有多至二三十年者。遣唐使自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2）前后共十九次，历二百六十四年之久，这是中日文化接触最繁荣的时期。日本遣唐使当时颇为中国所重视，如孝谦朝藤原清河归日时，唐玄宗曾亲赐以诗云：“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朝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飏，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⑦遣唐使归国之际，大都带去许多中国文物礼物。据说现藏奈良正仓院的所谓舶来品，大部分都是遣唐使所带去。留学生归国大都携有少数的书籍经卷，归国后主张移植唐文化于日本。如大化革新中心人物之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即曾受教于南渊请安。又高向玄理、僧旻二人归国后为国博士，任革新的重要任务，在思想上以佛教和儒教为中心，传授大陆文化并以中国政治机构为蓝本制定了所谓《近江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之类的“律令政治”。《近江令》是《天智天皇》时制定的，《大宝律令》是《文武天皇》时制定的现在都失传了。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制定的《养老律令》即《养老律》十卷、《养老令》十卷乃是把大化新政法典化了的著作至今尚大部分保存着。就中《养老令》三十篇共九百三十三条，系参考唐的《神龙令》、《太极令》及开元初年及四年之令。据仁井田升所著《唐令拾遗》附录日唐两令对照表，则日本令与唐令本文相当者共四百二十余条。其中学令、日本令二十二条和唐令相当者十二条，很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大学课目所受唐代学制的影响。其表如下^⑧：

| 《养老令》 | 《唐 令》 |
|---------------------------|-----------------------------------|
| 大经 { 《礼记》 《春秋左氏传》 | 《礼记》 《春秋左氏传》 |
| 中经 { 《毛诗》 《周礼》 《仪礼》 | 《毛诗》 《周礼》 《仪礼》 |
| 小经 { 《周易》 《尚书》 | 《周易》 《尚书》 |
| (以上各为一经) |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以上各为一经) |
| 《孝经》 孔安国、 郑玄注 | 《孝经》 旧令孔安国郑玄注 新令开元《御注》 |
| 《论语》 郑玄 何晏注 | 《论语》 郑玄、何晏注 |
| (学者兼习) | 《老子》 旧令河上公注 新令开元《御注》 (学者兼习) |

由上表很容易看出 在小经之中《唐令》四经并列，《养老令》删去《公羊》、《谷梁》二传 只有《周易》、《尚书》二经。次兼习科目中《唐令》举《孝经》、《论语》、《老子》三书，《养老令》删去《老子》 只有《孝经》、《论语》二种。由这两点不同 又可看出《养老令》百般制度模仿《唐令》 但也有它的特殊之点 首先是排斥《老子》。唐朝因以老子为祖，故尊崇之典特盛。封演《闻见记》云：“开元二一年明皇亲注《老子道德经》 令学者习之。”《唐六典》载国学教授之法，《孝经》、《论语》、《老子》皆为大经 注云：“《老子》用开元《御注》 旧令用河上公注。”《唐令》如此，但在日本则以儒教为本位，儒教与老子之异同，成为学者间的悬案。如奈良朝曾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策问，由遣新罗

使葛井广成的对策，便可窥见一斑。^⑨

问 李耳嘉遁 以示虚玄之理 宣尼危难 而修仁义之教 或以为精 或以为籀 其理云为 仰听所以？

对：窃闻眷山林以披黄缙，道德之玄教也，是则柱下之风，入皇朝以青紫，仁义之敦儒也，彼亦司寇之训。故清虚之理，焕二篇而同春日；折旋之踪，明五经而类秋月；诚能拯苍生之沉溺，继皇风之绝废。伏惟圣朝德光万寓，化高五岳 动植苞其亭育 翔走荷其陶铸 烈风五日 曾不鸣条；崇雨一旬，徒无破块。复入南蛮裸壤，占青霭以航海；北狄章身，蹈白云以梯山。巍兮蔼兮，其化如此。犹惧聃丘之教 未备污隆 玄儒之旨 有亏雌雄 思欲分其条目，辨其精籀。窃以玄以独善为宗，无爱敬之心，弃父背君 儒以兼济为本 别尊卑之序 致身尽命 因兹而寻 盐酸可断。

又同时大学助教下毛野虫麻吕的孔老《异同对策文》也说：

玄涉清虚 契归于独善 儒抱旋折 理资于兼济。

因为当时学者都认老子和政教无关，所以吉备真备著《私教类聚》其书虽不存 就《拾芥抄》所抄目录 其中第三条为‘仙道不用事’（即仙道无用之意）吉备真备曾任遣唐副使 在唐亲见君臣上下信奉道教 而归国后所见如此 可见《养老令》删去《老子》 不是没有理由的。

其次是关于《春秋》三传中删去《公羊》、《谷梁》的问题。武内义雄氏对此曾加以解释，并以后汉名儒贾逵之说为证。贾逵比较三传结果，特尊左氏，举左氏优于二传之点三十事。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左传》力说君臣大义与父子纪纲。如开卷第一篇称：“君子曰 颡考叔纯孝也 爱其母 施及庄公。诗曰 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 其是之谓乎！”第二篇称：“君子曰 石碯纯臣也 恶州吁而厚与焉 大义灭亲 其是之谓乎！”由此头二篇所述 即可见全书精神所在。《养老令》特取《左传》代表《春秋》 也就是着重这一点。至于《公羊》、《谷梁》二传则往往与《左传》之说不合，因此在大学科目中便把二者删除了。此外，《公羊传》富于革命思想 据当时一般盛行的何休注 则儒家元祖孔子已经因鲁而行王政，把周室和殷的后裔宋，同样降为诸侯。这种革命思想和自认万世一系的日本国体，是不相容的。这也是排除《公羊》的一因。^⑩

由上可见，《养老令》和《唐令》不同 它断然地排斥了老子的独善主义和《公羊》、《谷梁》的异说。大化革新发展了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大陆传来的新文化来巩固中央集权和奠定比从前更为广泛更为有力的剥削基础，这对于当时统治阶级是有利的。因此，它们就越来越欢迎中国的文物制度，而整个社会也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

二、近江奈良朝之汉文学

虽然如此，道家思想在日本也并不是没有影响。这由当时统治阶级所创作的代表汉文学的历史文艺作品中，很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纪神代纪》开卷是：

古天地未剖 阴阳不分 浑沌如鸡子 溟滓而含芽 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搏

易 重浊之凝竭难 故天先成而地后定 然后神圣生焉。

这种古代素朴的神道宇宙观，实际上即是依据《淮南子》、《天文训》、《俶真训》与《三五历记》把道家的宇宙观依样抄来。但是最明显的表现，还是在从淡海朝皇太子弘文天皇以下至葛井广成六十四人所写的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这诗集中多五言排律，诗虽不免幼稚，却是模仿初唐之风。卷首撰者自序，述汉文学的起源道：

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宪章法则，规摹弘远，夙古以来，未之有也。

由这段序看来，这诗集应该是代表儒家思想的作品。据序末云：“天平胜宝三年岁在辛卯冬十月也。”天平胜宝三年约当公元 751 年，唐天宝十年。可见自序作者是孝谦天皇时人，作于《养老令》之后，是站在儒家立场追怀“先哲遗风”的。实则这些先哲诗人很多具有隐逸、闲适、放旷之道家态度，和序文情趣不同。这只要注意一下各诗篇就容易知道了^①。

《述怀》 越智直广江

文藻我所难，老庄我所好。行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

《游龙门山》 葛野王

命驾游山，长忘冠冕情。安得王乔道，控鹤入蓬

瀛。

《幽栖》 隐士 民黑人

试出嚣尘处 追寻仙桂藂 岩溪无俗舆 山路有樵童。
泉石行行异 风烟处处同 欲知山人乐 松下有清风。

《游吉野川》 藤原宇合

芝蕙兰荪泽，松柏桂椿岑。野客初披薛，朝隐鬣投簪。
忘筌陆机海，飞缴张衡林。清风入阮啸，流水韵嵇琴。
天高槎路远，河回桃源深。山中明月夜，自得幽居心。

《暮春于第园池置酒》 藤原万里

城市元无好，林园赏有余。弹琴仲散地，下策伯英书。
天霁云衣落，池明桃锦舒。寄言礼法士，知我有龠踈。

就中藤原万里一篇有序，白云：“直以风月为情，鱼鸟为翫，令名徇利，未适中襟，对酒当歌，是谐私愿。”又云：“千岁之间嵇我友，一醉之饮伯伦吾师。不处轩冕之荣身，徒知泉石之乐性。”^⑫这简直是魏晋之流风余韵。此诗集中虽也有释智藏二首，所歌的却是“因兹竹林友，荣辱莫相惊。”盖此时佛教虽盛行，而僧人属词谈吐，尚带道家风味。《怀风藻》作于隋唐文化输入日本初期，所以能以老庄入诗，而和后来《养老令》之排斥老子的态度不同。

但虽如此，把道家思想的影响来和以后佛家输入的影响比较起来，就未免相形见绌了。遣唐留学生中分学生与学问僧二类，学生中以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二人为最有名。学问僧中则由于平安朝之空海（弘法大师）、最澄（传教大师）来

唐，遂开日本真言天台二宗，但这已是后话。阿倍仲麻吕于元正天皇灵龟二年（716）唐开元四年负笈来唐，时年十九，入京师学于太学，与公卿子弟交游，卒业为司经局校正（正九品下）改名晁衡。后因京兆尹的推荐，起拜左补阙（从七品上）。天宝二年（743）天平一五年，官至秘书监（从三品）兼卫尉卿。在留唐三十六年后，要随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时年五十六。王维赠以诗，赞美其“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诗曰：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映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舟发海中遇飓风，漂至安南驩州沿岸，时传晁衡遇难，李白闻之即作诗吊他。诗曰：

日本晁师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

晁衡于天宝十四年（755）从安南归唐，仕肃宗为左散骑常侍（从三品），仕代宗为兼镇南节度使，遂绝意东返。于代宗永泰五年卒（770；宝龟一年），年七十三，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同年日本亦追赠正二位。林罗山《文集》卷三十七有《阿倍仲麻吕传》两篇^⑬，并录其所作诗一首曰：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骎骎去玉津。蓬莱乡路近，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吉备真备本姓下道，于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 唐开元六年）来唐留学，研究经史，兼涉众艺，于日本留学生中最负大名。在唐十八年，归国后初为大学助教，学生四百人向他学习各种课业，分五经、三史、明治、算术、音韵、篆籀等六道。又以《礼记》及《汉书》授高野天皇，当时大学未备释奠之礼，吉备乃考礼典，制器物，对日本儒学文学的兴隆颇多贡献，因赐姓吉备，官从中纳言升右大臣。世传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中，吉备真备将当时通用的假字四十五字省偏旁点画，作片假名。又俗传《野马台诗》为其所作，《野马台诗》乃回文锦字。又真备归国从唐带去唐礼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测影，欘尺一枚，铜律管一部，以及欘如、方响等器，写律管声十二条，绘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十二只，平时箭十只。因其于律历之学无不精通，所带去历法诸书与日本历法之改革影响很大，乐书、乐器亦与奈良朝唐乐的提倡有关。由于输入中国文化的功绩显著，以至相传如围棋以及其他诸道，均由真备创始。卒时年八十三^⑭。

在留学生之外，更可注意的是遣唐学问僧之佛教文化的输出。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 唐高祖武德六年）学问僧惠齐等归日，舒明天皇十二年（640 太宗贞观十四年）学问僧请安归日，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高宗永徽四年）学问僧道昭从唐慈恩寺僧玄奘学因明学。齐明天皇四年（658；高宗显庆三年）沙门智通等奉敕入唐，从玄奘治法相学。天智天皇称制四年（665；高宗麟德二年）留学僧定慧等归日。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则天武后长安元年）僧道慈随第六回遣唐使栗田真人

入唐，研究三论，并从善无畏三藏受真言宗，于养老二年（718；玄宗开元六年）归日。前一年僧玄昉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来唐，于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开元二十年）归日，带往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并模仿唐制创设国分寺。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年间（752；天宝十一年）僧行贺来唐，在唐三十一年习唯识、法华两宗，传经疏至五百余卷。光仁天皇宝龟年间（约777以后；代宗大历十二年后）僧戒明、僧永忠来唐，戒明传《释摩诃衍论》，永忠在唐时学制茶及栽培法，传去茶道云云。

上述归日学问僧之中，尤以道慈、玄昉在唐最有名。道慈事迹见《怀风藻》略云^⑮：

释道慈者，俗姓额田氏，添下人。少而出家，聪敏好学，英才明悟，为众所欢。大宝元年（701；唐中宗嗣圣十八年）遣学唐国，历访明哲，留连讲肆，妙通三藏之玄宗，广明五明之微旨。时唐简于国中，义学高僧一百人，请入宫中，令讲《仁王》、《般若》。法师学业颖秀，预入选中。唐王怜其远学，特加优赏，游学西土，十有六年。^⑮

归国后，翌年曾与新罗学问僧神睿同以有德受赏，此据《日本续纪》养老三年（719）十一月乙卯朔条。据《怀风藻》则归本国后以“性甚骨鲠，为时不容，解任皈游山野，时出京师”。造大安寺时年七十，其诗有“结萝为垂幕，枕石卧岩中，抽身离俗累，涤心写真空”又有“僧既方外士，何烦人宴宫”之句，似乎归国后不甚得意。实则不然。其住大安寺时，甚得朝廷信任，曾讲《金光明最胜王经》（见《续纪》天平九年（737）十月丙寅条）。《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日本是具有极现实的镇护国家的政治意义，而道慈即为流布此经最有力之人。他所著《愚

志》一卷 论僧尼之事 略云：“今察日本素缁 行佛法轨模全异 大唐 道俗传圣教法 则 若顺经典 能护国土 如违宪章 不利人民。”（《续纪》天平十六年（744）十月辛卯条引）可见奈良佛教所以特富于国家的现世的色彩，和标榜《金光明最胜王经》以镇护国家，道慈的宣传，是有其独特的政治作用的。

从道慈讲《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后，接着便有玄昉之创设国分寺。国分寺即是依据此经卷六《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之说而建立的。天平十三年（741）时曾下诏规定，凡有国分寺的地方均造僧尼二寺 置《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各一部。僧寺建七重塔一区，天皇亲笔写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每塔纳入一部，僧寺即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称为法华灭罪寺。由此可见奈良朝建国分寺是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其模仿唐制，据木宫泰彦所说是仿唐龙兴寺之制^④ 证之以当时营造佛寺建立佛像等种种佛教艺术的东传，大概是无可怀疑的。

在遣唐学问僧的影响之下，更应该数到赴日唐僧人对于文化的移植。就中最有名的是天平胜宝六年（754）赴日之扬州龙兴寺僧鉴真及其弟子等。鉴真因应来唐学问僧荣睿、普照的招请，从天宝二年（743）天平一二年 即屡次企图东渡 挫折至于五次 当第四次问渡时 漂流南方 为炎热伤眼失明 然终不为屈。天宝一二年（753；天平胜宝五年）从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赴日 入东大寺 设戒坛于大佛殿前 为圣武上皇以下四百余人授戒，别敕建戒坛院于大佛殿之西，又于下野药师寺、筑紫观世音寺筑戒坛，称天下三戒坛，专备僧侣的得度、受戒。在努力弘通戒律之外，鉴真和他的弟子又以律僧而兼

天台学者携往《摩诃止观》、《法华玄义》等许多天台章疏。天平宝字三年（759）复建唐招提寺，讲四分律并天台教观。因东大寺为日本佛教的总本山，自此以后无论何人，若不受戒法于东大寺与其他戒坛，即不能为大僧。又就唐招提寺建立缘起，可见鉴真并其弟子和佛教艺术的关系。鉴真于造寺造佛经验很多，在唐时修造古寺至八十余处，随往弟子或为建筑家，或为雕刻家，而唐招提寺的堂塔伽蓝并佛菩萨像，实成于此辈之手^⑦。又鉴真曾刊刻三大部律，为日本雕版书最古者之一。鉴真精医学与本草学，传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弟子中长于诗文的，如曾寓台州开元寺僧思托，于日本汉文学的发达有所贡献。鉴真于天平宝字二年（758）赐号大和上，同七年（763）以七十七岁卒，思托作《伤大和上传灯逝》诗吊之曰：

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乐。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

“唐大和上东征”当时在日本称为盛事。“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肃，师资相传，遍于寰宇”。“亦如一灯燃百千灯，暝者皆明之不绝。”^⑧可见中国佛教对于日本佛教发展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

三、平安朝之汉文学

奈良时代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是南都六家，即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已开天台的端绪，与密教关系也深，但真正建立天台、真言二宗，还是从平安